

我所亲历亲见亲闻的溥仪

汪东林

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波澜起伏,从清朝末代皇帝到日本人的傀儡,从伪满洲国战犯到新中国的文史专员,晚年回归一个真正普通人的溥仪,才真正找到了心安之处。本文作者从1962年调入全国政协机关工作后,曾与溥仪做过一段时间的邻居,从他回忆叙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平凡的溥仪。



溥仪夫妇在天安门前合影。

初见溥仪

我1962年从作家协会调入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由于没有单身宿舍,我和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政协文史办公室工作的孔令源同志,受到特殊待遇,被派居住在南大院办公核心区的西楼(两层)上的一间20平方米的屋子里,待遇颇优。孔令源比我先到一个月,我一住进去他就对我说,你受优待,居住在办公核心区。他还神秘兮兮地轻轻对我说:“受优待居住在核心办公区的除了你我,还有两个人,就是刚刚新婚不久、当了政协第一批文史专员的爱新觉罗·溥仪夫妇,他们就住在对面的东楼一层,明天你就可以看到‘皇上’和‘皇后’,我们的福分大不大?他们是婚后外面找不到合适的住房,而受优待住进来的,已有几个月了!”他指着东楼一楼中间的一大门,那就是他们俩居住的地方。我望了一眼,很清楚,离我们的距离约30米,正巧面对面。



晚年的溥仪。

次日早晨6点半左右,我正做着体操,耳边传来“吱”的一响开门声,我举目一扫,正是昨晚小孔指给我看的东楼一层中间的大门。一走出来一位40来岁的女人,相貌优雅文静,手提一个装东西的中型黑色皮包。我远远地定心注目,心想这准是溥仪的新婚夫人了。女人刚顺手关上门,紧接着门又被推开,出来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他拉着女人的手,先下台阶,向我站的平台方向走来。

这一定是“皇上”溥仪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他们却没有注意到我。一直等他们上了台阶,到了我站着的平台,往大院的二道门走去,才发现了我。由于彼此陌生,又因为大院别无他人,迎面碰上,我主动向他们点头微笑,他们也对我微笑点头,算是还了礼,但彼此没有对话。

我回到宿舍,把刚才楼下平台二道门见到的一幕,告诉孔令源。他笑了,接着广东口音对我说:“慢慢你就知道了。我在文史资料办公室上班已一个多月了,我们的办公室在东院,房子矮小人拥挤,还有一个办公室就在楼下二道门东侧,比较大,但也很挤。但在北大院西侧,专门给第一第二批文史专员如溥仪、溥杰、杜聿明、宋希濂、沈醉等开辟了专员大办公室,铺有沙发地毯。他们每天同机关干部一样上下班,不是自己写稿,就是审稿编辑,还挺忙的。文史专员中最活跃、见人就熟的是沈醉,见人金口不开甚至目不斜视的是溥仪,倒不是他有架子,而是就这种怪怪的性格,有点呆头呆脑,挺好笑又好玩的!”小孔的一席话真的在后来相处的几年日子里,渐渐得到印证。

溥仪趣事

那时候,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文史专员毕竟是“特赦人员”,因而一般的机关干部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当时我同文史专员的关系比较密切,常常趁联系工作之机,主动找文史专员谈论他们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文史稿件等等,特别是与沈醉和宋希濂两位关系更密切些。关于溥仪的若干趣事,最早就是他们俩传到我耳朵里的。

趣事一:一次,溥仪和其他特赦战犯一起参观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派管理干部陪同,故官方也派人接待。溥仪3岁登基,1911年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被废除,他受优待继续在故宫做“小皇帝”,一直到1924年冯玉祥将军进北京把溥仪轰出故宫,时年已18岁,溥仪在故宫度过了少年时代及至成年。30多年后他再进故宫,不但自己觉得新鲜,而且别的同行都把他当成导

游,让他讲讲故宫过去的故事。他平日沉默寡言,但这次颇为兴奋,有问必答。他说故官比早年漂亮多了、变更变大了,自己真没有想到。他还讲起他所知道的,诸如先帝乾隆何以高寿89岁退位养老?珍妃何以被慈禧太后投井而死?他3岁登基何以在大和殿皇帝宝座大哭大闹?等等。但人们更感兴趣的是他为了学骑自行车,下令把养心殿附近的院落的大门门楣统统砍掉的故事。

原来,在故官小朝廷当皇帝的溥仪进入少年时期,也同别的孩子一样,什么新鲜就玩什么。那年月,学骑自行车是新鲜事。溥仪一学会就不愿意往故官大广场上骑,那里不仅路远,而且是砖头铺砌的,高低不平。他就喜欢在居住的养心殿附近小巷子、进院子,曲里拐弯、十分有趣。但所有院落的大门都有门楣,十分碍事。他便下令,两天内把附近几个院落的大门门楣统统砍掉。从此,骑车无障碍,痛快极了。溥仪讲完,沈醉就问:“那时做小皇帝,还是金口玉言,一张口就立即执行?”溥仪即答:“那当然。小皇帝也是皇帝,谁也不敢回话阻止!那时我还有随时处罚他们的权威呢!”所有同行者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笑声!

趣事二:由于刚刚走进新社会的大环境,从特赦战犯转身为政协文史专员,的确有个如何更快适应的问题。除少数人如杜聿明、郑庭笈等有眷眷从海外归来外,多数人都处于单身状态。他们除了劳动或上班,到了休息日便常常聚在一起,一块儿外出购物吃饭或逛公园、坐公交车等。别人都很快能适应,不会误时误地地,溥仪常常误时误地找不着地儿。于是大家决定必须有个人陪伴溥仪从单位出发,一块儿坐公交车,不料仍出了差错,闹出笑话。

有一次,沈醉、宋希濂、罗历戎等几个人带着溥仪,从西城白塔寺坐无轨电车去动物园。那时他们这些刚获得自由的人,都是排到所有乘客最后才上车。但那天直到所有人都上车了,溥仪还在车站等着。等大家发觉,去动物园的车已经启动了,车上上都在呼唤,售票员发现后,就在车窗同溥仪打招呼:坐下一趟车吧!沈醉等被挤在车厢里,根本无法向车下喊话。原来,溥仪是想让别人都上车,自己最后一个上的,没有想到这么挤,等他前面的一位中年妇女好不容易挤上去,结果车门一关,把他一人扔在车站了。溥仪无奈,只得等下一趟了。在车上的沈醉他们再急也没有用,只能到动物园终点站等溥仪了。这是从崇

文门到动物园的3路无轨电车,乘客虽多,但车也多。他们在动物园终点站等了两趟后面的3路车,仍不见溥仪的影子。沈醉说:“坏了,这位皇兄一定坐错车,不知上哪里去了。”

正着急,第三趟3路车来了。大家睁大了眼睛看,最后一个,溥仪下车了,立即转急为喜,没有说话,直招手。溥仪倒先开口了:“你们一走,我上了1路车,掏钱买到动物园,售票员说你坐错车了,下站阜成门你下车,倒3路车去动物园。没想到阜成门站的乘客比白塔寺站还多,我又让别人先上,到第三辆才上了车,这不,我就来了吗!”别人急他倒不急,一席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溥仪成家

1964年12月召开的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等6名政协文史专员,首批被推荐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

在这6名首批被推荐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政协文史专员中,溥仪尤其受到从上到下的关切。从1959年12月首批特赦战犯释放开始,各种消息的公开报道,溥仪的名字都排在首位。至1964年12月公布6名政协文史专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溥仪仍然名列榜首,这是一种政治待遇。在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和个人生活受到的关切照顾方面,溥仪也是十分突出的。



溥仪夫妇在新居听收音机。

首先是他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结婚成家,最早有了一个和美的家庭生活。溥仪和李淑贤夫妇1962年新婚之初,曾住全国政协核心办公区,在诸多新的新婚政协文史专员中,是一个特例了。后来找到新住宅,是地处全国政协机关北边的一栋独立小四合院,这也是特殊照顾。诸如杜聿明的夫人辗转从美国归来,宋希濂与易吟先新婚,也只是搬进唐生明(唐生智之胞弟)与老电影明星徐来夫妇同住一个较大的东城前厂胡同的四合院。

至于婚姻本身,以溥仪的历史经历和个性特质,要他本人找到合适的新婚对象,难度可想而知。据我所知,李淑贤女士是北京一家大医院的妇产科医生,溥仪所在的政协机关和李淑贤所在的医院诸方面,都以多种方式出力,经好些位红娘分头牵线才促成的。当初我所见到的大清早溥仪送夫人上班到门口才止步的一幕,后来彼此相熟后他曾亲口对我说过:“她上班的医院在朝阳门外,路

上要走一个多小时。”她白天上班,早晚还得照顾我,很忙,也很累!”话语中透露出这对新婚夫妇的情感。

他们的婚礼据说也举办得热闹而隆重,地点在东城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即今之欧美同学会所在地),虽然其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没有摆宴席,但仍然是茶话会加酒会的形式,到场祝贺者近百人之多。特别是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北京市委统战部几家都派有部级干部出席,颇为重视。而且由溥仪结婚开了头,那几年宋希濂等人办婚事,地址也沿用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但规模都不及溥仪的婚礼。

三次流泪

所有政协文史专员都单独或集体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的接见,也在公众场合见过毛泽东主席。唯独溥仪1961年在中海南海颐年堂受到毛主席的单独接见,谈话长达5个多小时,还共进晚餐,其间溥仪曾几次痛哭流涕。回政协机关后,溥仪与领导和同事每次谈起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谆谆教导,仍常常泪流满面。

溥仪性格内向而孤僻,平时不爱多说话,特别好哭。前面所述,毛泽东单独接见他,谈了5个多小时那回,他中间哭了几次,特别是一开头,溥仪刚讲了“我是一个对国家和民族负有大罪的人,毛主席您老人家还接见我”这句话,就开始哭起来,在场工作人员劝他,毛泽东也劝他,并等他平静下来。

溥仪特赦后曾由北京市安排在京郊劳动一年,接触社会生活,廖沫沙全面负责此事,曾设宴招待,在劳动结束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时,廖沫沙也到场祝贺。特别是1962年他和李淑贤女士举办婚礼时,廖沫沙代表北京市委出席,讲了一番道喜的话。因此当首次公开广播批判“三家村”那一天,溥仪早起没有听清楚,上班后报纸一到,头版头条就有廖沫沙的名字,急着看消息内容,没有看完就趴在办公桌上哭起来!好几个专员同事围上去问他,他竟一面哭一面大声说:“这是怎么回事呀,廖沫沙可是一个大好人呀……”此事被反映后,有关领导指示一个办公室的专员同事,要帮助他提高认识。没料到次日还没有开会,有同事先单独同他交谈几句,他就说:“您别规劝我,我忍不住,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好人嘛!”说着说着,眼泪又掉出来了。

1966年8月,文史专员被勒令停止文史资料工作,在机关搞卫生打扫厕所,不得参加机关的政治运动。没多久,溥仪原班,劳动不,要求机关送他去医院就诊。机关的临时负责



1928年,郭沫若流亡日本,住在东京附近的千叶县。一天,在逛书店时,他发现了《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如获至宝。很快将东京书店和东京图书馆中有关甲骨文字以及金文的书籍,全部都翻阅了一遍。

接下来,郭沫若又访遍了日本所有的甲骨收藏者,把看到的甲骨藏品都拓印下来,掌握了大量的实物资料。那一时期,读甲骨文、抄甲骨文、钻研甲骨文,成为郭沫若每天雷打不动的功课。每天吃饭的时候,他也会把骨片一块块地摆在饭桌上,让全家人辨认,那是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候。

1930年1月,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这部包括“甲骨文”在内的著述,把甲骨文研究与古代社会的研究结合起来,一经面世,即大获好评。接着,他



20世纪90年代初,已是耄耋之年的施蛰存住在上海一座不起眼的小房子里。他的卧室兼书斋显得非常陈旧,但几顶高大的书橱里溢出淡淡书香。老两口的生活也很安逸,他的妻子喜欢靠着窗口戴着老花眼镜低头补缀旧衣服,高而瘦的施蛰存每天早上都精神矍铄地坐在书斋里开始他的创作生活。

一天,几位远方宾客登门拜望施蛰存。大家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施蛰存一上来就开诚布公地说自己是个“出土文物”。他解释说,这几年来看他的人应接不暇,但是他对社会、对社会的贡献未必会有社会上传闻的那么突出,都是一些人的谬赞罢了。

当有人询问他《文艺百话》出版事宜时,施蛰存突然很兴奋地说道:“不瞒大家说,我今年还要编写一两本



1949年4月初,叶圣陶出任华北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前身)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要承担教科书的编写、编辑、出版与发行等职能,下设国文、史地、自然三组,其中国文组负责编写教科书,制定新的课程标准。

这年8月,叶圣陶主持草拟《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时,第一次使用“语文”作为学科名称。而在此之前,我国没有“语文”这个词。民国初年,小学和中学的汉语课程统称为“国文”。1920年,北洋政府将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国语”(后小学各年级均改为“国语”),中学仍设“国文”课。

1950年6月,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出版了全国统一的以“语文”命名的教材。叶圣陶在《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大意”中指出:“说出来的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学



戈公振是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爱国进步新闻记者,我国新闻学和新闻事业史研究的开拓者。戈公振的译著《新闻学撮要》一书于1925年2月出版。梁启超为该书作序:“斯编组织完善,章节明晰,且于报界之甘苦难言,反复道之。学者勿无端入此界,勿轻易入此界,与入此界后勿因现状之未着而灰心于此界:斯盖先得我心,久蓄而未发者也。”此书上市后很快售罄,4个月后再版。戈公振在《再版的序》中写道:“此书的第一版,居然有人欢迎,立刻售罄,这是编者所非常欣慰而以荣幸的。”

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于1927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约29万字,首次全面、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勾勒出了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宏观脉络,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奠基之作。该书出版后曾多次重印,日本学者小林保将该书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27年至1928年,戈公振自费出

郭沫若痴迷甲骨文

王剑

又相继出版了《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一系列甲骨文专著。其中,《卜辞通纂》将“卜辞之精粹者”分8类编排并作考释,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新体系,“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郭沫若兴奋之余,作诗一首:“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一片甲骨惊世界,蕞尔一邑震寰宇”。

郭沫若晚年又组织编撰了13册《甲骨文全集》,收入41956片甲骨,不仅对数千片甲骨文进行逐条释文考释,而且对断片缀合、残辞互补、卜法文例、分期断代诸方面都有独到的创见。唐兰评价甲骨文研究时说:“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雪堂是罗振玉,观堂是王国维,彦堂是董作宾,鼎堂是郭沫若,这就是鼎鼎有名的“甲骨四堂”。

施蛰存自称“出土文物”

周星

出来。”大家都很惊愕,表示施蛰存都88岁高龄了,为何还笔耕不辍?他淡淡地说:“人生在世,活着总要做点事嘛!就像学生要学习,商人要做生意,军人要打仗,工人要工作,文人自然也不能放下手中的笔。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去做自己应做的事。我尽我心,我尽我力嘛!”

说完后,施蛰存又主动提及自己成为“文物”的原因,就是1933年与鲁迅先生的那场笔战。当时施蛰存建议文学青年要多读点古文,把古文作为“修养根基”或“修养之助”。这一观点被鲁迅先生指责为别有用心而遭到严厉批评。这场风波如今看来是个真诚的误会,施蛰存对此坦言:“我不怨恨他,后来的事不能让鲁迅负责。”施蛰存直率的品质让在场的宾客们赞叹不已。

叶圣陶首提“语文”

周惠斌

他还专门解释:“什么叫语文?语文就是语言,就是平常说的话。嘴里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在纸面上的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

叶圣陶对“语文”学科的命名、解读,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认同。从此,“语文”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成为我国中小学母语课程的通用名称。

1960年1月21日,叶圣陶在答孙文才的信中,解释了“语文”一词的由来和含义:“‘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之中小学语文课本。当时想法,口头为语,笔下为文,合成一词,就称‘语文’。自此推想,似以语言文章为较切。文谓文字,似指一个个的字,不甚恰当。文谓文学,又不能包容文学以外之文章。我个人想法如此。”阐述了“语文”含有“语言”和“文章”之意。

叶圣陶不仅首先提出了“语文”一词,而且还为《语文》教材题写了“语文”二字,饱满厚重,儒雅周正,成为一代代学子永远的记忆。

戈公振的四部新闻学著作

王荣 王抒滢

国考察。这次考察活动行程数万公里,途经欧、亚、北美3大洲,搜集了大量新闻史料,实地感受了世界新闻发展的潮流并对中外报业进行了深入思考。回国后,他将考察期间收集的各类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纂成《世界报业考察记》一书,“以供我国报业之参考与勉励”,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但上海“一·二八”抗战期间,书稿及印版全部毁于战火。所幸的是,20世纪50年代戈氏后裔将其藏书和手稿捐给了上海图书馆。2017年,《世界报业考察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被称为“炸不毁的书稿”。

1935年10月22日,戈公振在上海病逝。戈公振遗著《新闻学》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全书分为报纸的起源、中国现代报纸的进化、报馆组织、通讯社、报业教育、报纸的命运等6个篇章,戈公振堂弟戈绍龙作“弁言”。该书尽管在篇幅、体例、影响等方面不如《中国报学史》,但全书中流露出的对世界新闻业的熟悉程度、对国内新闻业的关切心情、对新闻理论的驾驭能力、对新闻实务的探索热情,显得更加淋漓尽致,是一本不应该被遗忘的著作。